

悲壮之师血战湘江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命令湖南军阀何键调集中央军和湘、桂、粤军近26个师30万兵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

过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伤亡巨大，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并由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共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及由其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全权指挥，军事上走的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动进攻，夺取中心城市，打阵地战拼消耗，而不顾红军兵力弱和装备差的实际，排斥游击和运动战。红军虽然最后渡过湘江西进，但其惨烈牺牲，不得不让全党上下和红军开始思考军事指挥问题。它既标志着形式上的“三人团”最高权威的盛极而衰，也标志着实质上的两人决策核心名存实亡。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广大红

军干部逐渐觉悟到，湘江战役的巨大牺牲，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觉醒、觉悟的重大转变。红军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为之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和思想基础。